

みんなくりポジトリ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Medium in the ‘Jie Chi’ :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n ‘Zongzi’ and Rituality in Rural Nanjing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18-03-15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川瀬, 由高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15021/00008915

应节气的媒介物

——对于南京周边乡村中粽子的人类学考察

Medium in the ‘Jie Chi’: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n ‘Zongzi’ and Rituality in Rural Nanjing

川瀬 由高

KAWASE Yoshitak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about contemporary meaning of Zongzi or rice dumplings as ritual food in Duanwu Festival as one of several annual events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China, based on empirical data through my 23-month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duration. After the 1980s, there is a common sense in anthropology, that the perspective small community has influenced by larger outer world, typified by the concept of articulation. Food culture studies also follow this perspective, not a few studies stressed on outer influence on (dis) continuity of food, such as localization of McDonalds in East Asia by James Watson. Although it can be said that environment surrounding food ways has largely been changed, Zongzi as ritual food has cultural continuity. Because zongzi in the Q village, the field site I did fieldwork, has accompanied norms which must be prepared to coincide with Duanwu Festival, and which should be presented to close kin and friends as a gift, so if one decide not to give this gift, one may experience rinsing conflicts in human relationships. In the Q village, Zongzi which has unique rituality is also a tool of reconfirmation / creation of relationships. Tasting Self-made Zongzi is not only on flavor, but also the enjoyment of face-to-face relationships.

1 序文：对于 / 从粽子的视角

本文以南京市郊外农村的生活场景中的粽子为视点，对粽子作为各种人际关系之媒介的作用进行民族志考察，以期厘清在各种“外在刺激”之下，如今依然被食用的粽子所具有的“内在影响”的逻辑。

饮食文化学领域通常将食物分为“仪式食”和“日常食”两种（朝倉 1995：55）。因为中国人一般在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的时候吃粽子，所以按照这个分类法，粽子属于前者。学者何彬把这些食物称呼为“节旬食”（节日食品）（何 2004：9-10）；同样，在中国民俗学领域的分类中，粽子属于“岁时节日民俗”里的“应节食品”（钟主编 2008：349）。与此同时，大量的文献研究解释了端午节的传说，以及应节吃粽子的仪式性来历。

粽子不是日常生活里常见的食物，而是属于特定的日子里的特殊食物。学术界曾关注粽子的传播状况，例如研究粽子文化从中国到日本的传播过程，以及日本各地粽子之品种（中山 1964）；还有对包粽子习俗的分布状况的研究（本間・石原 1995；1996；1997a；

1997b)等。另外,“照叶树林文化圈”理论也关注过粽子或红小豆糯米饭的分布状况,该理论把粽子视为照叶树林文化的代表,指出只有在照叶树林地带的社会里才能看到对于年糕一类糯米制品的嗜好(佐々木 1987: 66-67; 1994: 198-200)。除此之外,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成果里还出现了以粽子为关注点的人类学研究(杨 2011; 杨、杨 2012)。可以说,这些成果充分阐明了不同时空里的粽子的多样性。

可是,目前而言,粽子研究领域还缺少系统的民族志研究,尤其是站在“饮食实践所造就的社会关系”这样的角度的民族志研究(cf. 櫻田·稻沢·三浦编 2016)。为了分析处在农村社会生活中作为“节庆饮食”或“仪式食品”(ritual food)的粽子,笔者认为与其着力于粽子本身,不如将关注的重点调整为:以粽子为媒介,进而通过这个食物媒介来考察当代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场景,并把粽子作为起点,关注粽子所连接起来的“亲近性(relatedness)”(Carsten 2000)。本文想要说明的是无论是经过集体化时代的断层,还是当代社会的变化,端午节的核心价值始终在于“跟亲密的人一起享受节日的气氛”。因此,大家一起亲手包粽子,相互馈赠粽子,粽子是一起享受端午节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媒介物。

2 高淳“饮食文化”里的粽子

笔者的田野调查地是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最南端的高淳区(图1)。自2013年10月初次实地调查后,笔者于2014年3月至2016年,长住高淳Q村并展开了为期23个月的调查。2000年左右,高淳作为螃蟹的一大产地名扬整个南京(川瀬 2016a: 249)。每年10月至11月是吃螃蟹的最佳时节,这时候大量的外地游客到访高淳¹⁾。除了享受美食,游客们一般还会顺便去逛一逛高淳县城内自明清时期留存下来的古街——“高淳老街”²⁾。关王庙和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旧址(旧吴氏宗祠)等景点就坐落于这条街上,此外也有许多贩卖各种食物、饮品和特产的店铺,其中作为当地特色食物出售的有螃蟹、蟹黄汤包、风干的鸭翅膀、各种腌菜和咸菜等等³⁾。



图1 高淳地图(笔者作成)

在这个意义上，与螃蟹这类使高淳扬名的食物不同，粽子可以说是“没什么特色”的食物。高淳既没有什么特别的制作粽子的方法，也没有在端午节之外的其他特定场合食用粽子的习俗。自然的，这种在全中国各地都能普遍看到的传统食物在“高淳文化研究”的领域里很少有人触及。因此本研究关注的是围绕着粽子所展开的地方社会生活，在此目的之上将粽子作为一种观察当地社会的视野来展开探讨。

首先，我想在这里梳理一下高淳的端午节的概况⁴⁾。虽然关于端午节的由来有各种说法，但在中国，人们通常以屈原的纪念日这一说法来说明赛龙舟和吃粽子的习俗的由来（王 2001：110；cf. 張 2012：199）。然而在高淳，端午节不仅被认为是纪念屈原的节日，同时也被有些人当作是纪念春秋时代的伍子胥的节日。比方说，以下所列举的是2015年端午节的时候，高淳人的“微信朋友圈”里的一句话（2015年6月20日）：

快到端午节了，有不少朋友又要在互祝“端午节快乐！”错了！各位亲：端午节不能互祝快乐的，最多互祝“端午安康”。因为端午节是个祭祀节日，这天伍子胥投钱塘江，曹娥救父投曹娥江，大文豪屈原投汨罗水。

这位当地人列举了伍子胥、曹娥以及屈原，实际上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在中国各地本就有不同的传说。如宋颖曾指出：除了屈原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纪念东汉的曹娥，越王勾践，而且“伍子胥的传说，在浙江一带流传很广，至今他仍是苏州地区端午习俗要纪念的人物”（宋 2007：23）。高淳与苏州同属吴语方言地带，所以还有类似于苏州的其他习俗，例如高淳还有一个传说：伍子胥开挖胥河（胥河是从东到西经过高淳的运河。据当地人说，从固



图2 高淳固城镇的伍子胥塑像
(2013年10月3日，笔者拍摄)



图3 高淳下坝的划龙舟 (2014年6月10日, 笔者拍摄)

城湖流出来的水最后连接到苏州太湖, 而且在高淳有中国最古老的人工运河)。由这个传说可见, 伍子胥在高淳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历史人物。地方博物馆里也有专门的解说面板, 固城镇中心的大转盘上面还建有他的塑像 (图2)。

另外, 赛龙舟 (dragon boat festival) 是中国端午节时举行的民俗活动之一。在当地, 赛龙舟被称为“划龙舟”, 也叫“赛棹”, 其具体活动在高淳区内也不尽相同。据《高淳县志》里的描写, 高淳东边五月初五划龙舟, 西边地区则在六月初六举行划龙舟 (高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2010: 1015)。根据笔者的调查, 关于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在下坝举行赛龙舟 (图3), 其目的有人说是祭祀龙王的, 也有人说是祭祀关公的, 还有人说农历五月十三日是伍子胥的生辰。总之, 诸如此类的叙述同时存在, 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话语存在。而且, 按照当地报道人的说法, 以前定埠会6月初六在胥河上举行划龙舟。看来划龙舟的时间虽然各异, 但可以确定的是并不仅限于端午节这一天。

中国人每逢佳节都会吃特定的食物, 但食用的时间却因地而异。为了确认一年中吃粽子的情况, 按照地方文献 (高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2010: 1011; 陈 2014), 笔者在表1上整理了高淳的节庆饮食的时间和内容, 该表的右侧内容表示的是笔者的调查村·Q村

表1 高淳以及Q村的节庆饮食 (笔者作成)

节日	高淳的节庆饮食	Q村的节庆饮食
春节	欢团 ⁶⁾ , 米糕, 团子	—
四月初八	乌饭	乌饭
端午	粽子, 雄黄酒 (不复存在), “十样红”	粽子
六月六	包子	—
中秋	月饼	月饼
重阳	菱糕	—
冬至	团子, 南瓜糯米饭	南瓜糯米饭
腊月初八	腊八粥	腊八粥

现在的习俗。地方志上的记载是，端午节“早上吃粽子，中午喝雄黄酒，吃苋菜，红烧肉，黄鳝，咸鸭蛋，河虾等‘十样红’”，但是喝雄黄酒的习俗已不存在（高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2010：1015⁵⁾。具体到 Q 村的话，现在可以看到的只有吃粽子的习俗。

那么，为什么在端午节要吃粽子？对屈原的祭祀一般被认为是其理由，但在近年的研究中其被证实为仅仅是一种民间流传的说法（張 2012：199），吃粽子这一习俗的起源本身与屈原没有任何关系（王 2001：114）。探讨端午节起源的中山提出为辟邪供粽子（中山 1964：120-121）。周星则指出了：包粽子的叶子（苇叶，竹叶，荷叶）是益气健脾、开胃消食之良药，反映了“药食同源”的原理（周 2016：122）。

虽然说这些关于粽子的象征论研究提出了有益看法，但仅止于此的话，我们就无法了解到当代的生活情景中粽子的多样性格。笔者在 Q 村包粽子的时候，既没有听到“最打动人心的，也是广泛扎根于老百姓中的”的纪念屈原的说法（何 2004：18-19）、也没有听到在高淳流传的纪念伍子胥的说法。笔者所遇到的是更扎根于个人与村落生活情景中的粽子。

下一节，通过笔者所居住的家庭里关于粽子的做法、送法、吃法的个案，来探讨粽子在村落社会和个人层面所具有的意义。

3 个案

3.1 包粽子

2015年距离端午节还有三天的时候（2015年6月17日），为了准备过节，房东家的吕阿姨（假名）从上午开始包粽子。11点左右，午饭之后的闲暇中，笔者想了解作为一个民俗文化的粽子在这里是怎么被制作的，所以提问道：“我也可以包吗？”。“不可以！”阿姨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让我有一点意外。笔者2014年3月开始住在 Q 村进行田野调查，从那个时候起一直仰赖吕叔叔和吕阿姨的关照。此个案发生时住在吕家的时间已经过了大约15个月，之前大部分的劳动和家务笔者都可以参与（帮忙）。比如之前包饺子，做米糕，做香肠等的时候，几乎都没有受到这样的拒绝。所以，阿姨的这次反常的回应引起了笔者的兴趣，而且一开始我仅以为或许是因为有性别等规范的存在？于是我问她：“哦，是不是有什么规定？”，阿姨回答说：“不是规定，是要耐心包，一般男人不会。”后来，12点左右吕阿姨终于允许我可以跟着她一起包了，但笔者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阿姨一开始要那样说。

这一天，吕阿姨在房屋内的客厅里包粽子。她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把大一点的板凳当桌子，包每一个粽子平均花费 4~5 分钟的时间。“粽叶”是她从村子里的池边上摘来的箬叶（*Indocalamus Leaf*），粽子里不放味精，但会加入花生米。这一天她包了两种“馅”的粽子，一种是糯米里放“咸肉”，另一种什么也不放。图 4 表明了包粽子的程序。

笔者一边拍摄吕阿姨包粽子的样子，一边开始模仿，但包得一点都不好看，切身体会到了这是一个技术活儿。阿姨说，“田里干活简单么，干几下就学会了。但这样的〔包粽子〕不行哦”，笔者也感觉到言下之意“男人不会包”的意思。但其实，她的表达包含着另



①将两枚重叠的叶子顶端向内侧卷，做成圆锥状，用大拇指压住叶子以保持形状，同时向其中装米。



②将叶子的另一端向面前折，将装了米的部分盖住。



③进一步将叶子沿着圆锥的侧面包裹，并移到右侧。



④使右侧与新拿来的叶子相垂直，然后插入这片叶子。



⑤将粽子立起来，让新加的叶子的部分成为底部，然后抽出大拇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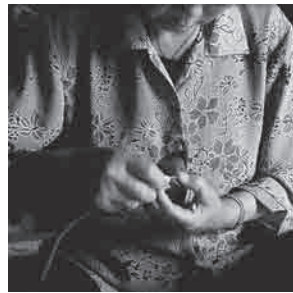
⑥从大拇指抽出的地方再往里面加米。



⑦将新加的叶子向面前折，然后盖住塞了米的地方。



⑧将剩下的部分沿着粽子裹上。



⑨最后用线捆住。

图4 粽子的制作步骤（2015年6月17日，笔者拍摄）

一个故事。我们继续包的途中，吕阿姨还说道：“我不会包四角的粽子，那个没学过。那个好看一点”。此后，吕阿姨提到了一个自我到这调查一年多的时间中从没有听过的故事：

“分家之后，婆婆不给我包〔粽子〕了，我那个时候要〔种田的话都要〕插秧么，农忙得要死，她还是说不给我包。”

“不给，你们就吃不到了，这个意思。”

“她（婆婆）就是这个想法。她就怕干活，都懒的，不像我妈妈，是吧。”

在此谈到的是，吕阿姨与婆婆，即吕叔叔的母亲 Y 氏之间的矛盾的话题。

吕叔叔和吕阿姨1978年结婚之后一直跟四兄弟一起住在吕叔叔的父亲家(图5)，到了1984年、吕阿姨30岁，女儿6岁，儿子4岁的时候分家了。当时，吕阿姨自己不会包粽子，也不懂包的方法。所以，如果 Y 氏不包的话，吕阿姨一家人(包括作为 Y 氏儿子的吕叔叔)就吃不到粽子了。吕阿姨的理解是：明明会包粽子，而且还没有农活要干的 Y 氏是在有意识刁难人。当时，吕阿姨的母亲不会包粽子，所以吕阿姨自学成才。“后来某一天包了20个，就自然学会了。”

2015年，Y 氏身体不舒服，所以每隔10天，由次子吕叔叔，以及同样住在 Q 村的三子、四子的三家人轮流照顾老人⁷⁾，因此，吕阿姨也要负责给婆婆准备饭。这样，表面上吕阿姨维持了亲属关系规范下的人际关系，但私情里却对婆婆有些微辞。后来另外一天，吕阿姨很明确向笔者表达了对婆婆的不满。分家之前，吕阿姨生了女儿之后，除了帮助丈夫干农活之外，自己还做渔网去街上卖。通过务农赚的钱都是属于大家庭的钱，Y 氏“一点都不给钱”。加上，春节的时候也不怎么给钱，吕阿姨当时面临“不分家就拿不到一分钱”的困境。

这个家庭故事也许只是从媳妇的观点所看的主观感受。但我们要在此注意到的是一个充满“人”味的个体生活史故事的证明。她举了围绕粽子的关系的故事：“四角形的粽子好看”含义是自己的技术也不够成熟；以及从前没有人好好教过她包粽子；而且还会让她想起来年轻的时候与婆婆的磕绊的记忆。

包粽子需要技术，不容易准备。Y 氏选择了不给儿媳粽子(不给她包粽子)，这个行为其实很明显地划分了“自己的家人”和“儿子和媳妇”(即吕叔叔和吕阿姨)之间的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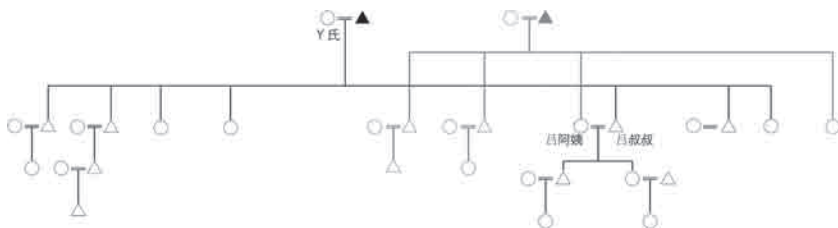


图5 2015年吕家亲属图(笔者作成)

3.2 送粽子与相帮

粽子的制作很费功夫,也有一些难度。因此,在Q村并不是所有家庭都会自己包粽子。即便如此,很多人在端午节依然能得到粽子。那是因为总会有人给自己送粽子。

比如说,2014年,吕阿姨制作了大量的粽子送给了亲戚朋友。用吕阿姨自己的话说:“给大舅和小舅家3~4个,我妹妹家10个,给我妈3~4个,邻居3~4个,一共20多个”。此外,吕阿姨还给“工厂的”也送了,Q村的村边上有工厂,“送给他们(外来打工者)30个,还送了鸡蛋(茶叶蛋⁸⁾!”这些再加上自家的份,吕阿姨做了70个以上的粽子。

如此大量的粽子不全是吕阿姨一个人包的。2014年端午节的三天前(2014年5月30日),吕阿姨在Q村中关系最好的朋友和吕叔叔的嫂嫂来到家中帮忙,三人从早上7点一直到中午之前一直在包粽子。端午节前一天(2014年6月1日),午饭之后,粽子被装入红色的塑料袋分发到各个人手里。而且吕叔叔还亲手把粽子给了母亲和自己的一个老表。结果前来帮忙的两人反倒没有得到粽子。对此吕阿姨说:“这些是关系比较好的人,需要的时候过来帮忙”。当对方需要的时候自己也会去帮忙。

这一点与费孝通的调查地的江村(開弦弓村)有着相似之处。据1996年在江村调查的常向群(2009)提到,在江村,除了端午节之外,在其他场合也经常能看到粽子,比如盖房子,清明节扫墓的时候。“由于这些场合需要大量的粽子,自然也涉及人手帮忙”(常2009:80)。而且,每家户都有“相对固定的互助小组”,其来自家庭关系网络中的自家人,亲戚,邻居,同组村民或朋友等。常向群还指出,这种劳动力互动的小组是建立在馈赠性往来之上的。比如,村民注重热情招待他人并乐享其中,这是它们加强关系的一种投资,而且劳力支持的安排可以被看做是在馈赠性往来中投资的自然结果(常2009:180-181)。虽然在Q村包粽子的次数不似江村频繁,但因为包粽子“需要一定的技术和人手帮忙”(常2009:80),所以在Q村也出现像江村类似的“相帮”的情况。

还有,从吕阿姨2014年的赠与粽子的情况可以看到围绕粽子的两种关系性。一种是帮忙包粽子的人际关系,另一个是送粽子的人际关系。前者是随叫随到的可以依靠的的互助关系。这些人包括最亲密的朋友,还有父系的亲属。可以说,这里存在着相互扶助性的信赖关系,吕阿姨所说的“关系比较好的人”就是这样一群人,也可以理解为常向群所指出的“相对固定的互助小组”。后一种关系,受到“亲密程度”的影响,它决定了粽子的流动,这种关系比较重要。除了要送给婆婆以外,吕阿姨不送给夫方亲属,因此基本不受父系亲属制度的规范。还有,因为粽子主要是送给妻方亲属,特别是吕阿姨自己的直系血亲,但却没有送给来“帮忙”的、跟她最亲密的朋友。另一方面,她还把粽子送给邻居,甚至“工厂的”人。就是说,这里有可以请求帮忙的亲密性和送粽子的亲密性之间的划分。

在此,我们要考虑一下中文里的“关系(*guanxi*)好”的深度。亲属里有送的人和不送的人,而且朋友里也有送的和送的人——包括可以依靠“相帮”的最好的朋友。这样的划分来自吕阿姨所说的“可怜”这个词汇。其最好的例子是给“工厂的”的赠与。实际上,吕叔叔和工厂的老板之间有良好的关系,吕叔叔家自己养的鸡和鸭子的饵料来源于工

厂食堂的剩饭。基于这样的关系基础之上，考虑到工厂里打工人们回家过端午节的背景，吕阿姨送了三十个粽子给工厂的老板。同样，“婆婆”Y氏年纪大了，邻居“老表”其妻子刚去世，儿孙也住在村外，他们都属于只能一个人过端午的情况，吕阿姨赠与粽子的行为就能让人很具体地想象到那些自己不会包粽子的人的面孔。

另一方面，上述这种对送粽对象的面孔的情景式联想发生于2014年，与之相对的2015年，吕阿姨不再赠给自己的兄弟姐妹，而是仅送了十个左右的粽子给自己的母亲。她讲，“今年不要给人家了，累死了。包也辛苦。”“小舅家么，我给他皮（=粽叶）了，你自己包或者托人家包吧”。其实，吕阿姨自2015春节期间身体抱恙，已经住一次院了。因此，她决定2015年不再包那么多的粽子，只亲自包了自己家所需要的分量。

通过这样“送粽关系”的变化，我们可以想到费孝通（1991）所说的“差序格局”的概念，以吕阿姨为起点的同心圆形的关系。最接近的圆里有自己的家人，接下的一环有自己的母亲。之后，自己的兄弟姐妹则站在其圆之更远的一层里。

如果把这种具有柔软性和伸缩性的选择性赠与与端午节的规范性赠送比较的话，就更明显了。在端午节，Q村有这样一个规范：女婿要送给丈母娘家礼物，女儿也要给自己的父母以及父亲的兄弟送礼物。吕叔叔这样讲道：

“你大姐（即吕叔叔的女儿）给我烟了。”“五月五（端午）、八月十五（中秋）、一月一日（春节）她要送东西，所以她一年需要花3,000元。你看，要花不少的钱。”

这种节日中的礼物来往被视为一种礼节，是具有规范性⁹⁾和不可缺少的。吕叔叔本人也要遵守给岳母礼物以及向她问候这样的规范。同时，诸如烟，猪肉，鸭子，或“牛奶”之类的礼物也沿着父系亲属的方向流动。与此不同，粽子的流动则重叠了以个人为起点向外展开的同心圆关系，以及那种可以联想到具体面孔的情景式的关系。即前者是一种相对固定的规范，而后者则是具体性的和情景式的关系，笔者所调查的赠送粽子的个案则是这两种关系的重叠。

3.3 吃粽子，“玩一玩”

在Q村，除了在门口或窗口上“插艾子”之外（图6），端午节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虽说村民谈到端午是伍子胥的生日，但人们并没有把传说跟粽子关联起来，只是按照端午节一般要准备粽子这个习俗准备粽子而已。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像James Watson（1988）所说，村民重视的是正确的举行（orthopraxy）而不是观念（orthodoxy）。

端午节那一天，跟《高淳县志》所指出一样，Q村村民早上吃粽子。粽子用老虎灶蒸出来之后，插筷子，舀砂糖，把粽子当做早饭¹⁰⁾吃（图7）。吕叔叔跟笔者说，“鸡蛋和粽子都要吃两个。吃二个就最好”。吕阿姨还说，以前“端午节，我们吃鸡蛋，绿豆糕，粽子。虽然现在还吃茶叶蛋，但好多人已经不吃绿豆糕了”，因为“人家不喜欢了”。另外，作为中国各地常见的“喝雄黄酒”的习俗（万、周 2004：122-123）也在Q村消失了¹¹⁾。



图6 插艾子 (2015年6月20日, 笔者拍摄)



图7 早上吃粽子和茶叶蛋 (2015年6月20日, 笔者拍摄)

此外, 端午节的中午, 亲人们在吕叔叔的丈母娘家 (指吕阿姨的大弟弟家, 吕阿姨的母亲当时住在那里) 吃午饭。桌子上不但有许多菜, 也有饺子。2015年当天中午共食 (commensality) 的成员有吕叔叔、吕阿姨、大舅、小舅及妻儿, 大舅的女儿, 阿姨的孙女, 阿姨的妈妈, 以及笔者——简单地说是以吕阿姨的妈妈为中心的“一家人”。这个时候, 反而没有吃粽子。晚上一家人吃饭时也没有吃粽子。可见, 粽子是在各家各户家庭内部吃



图8 提前一天吃粽子 (2015年6月19日, 笔者拍摄)

的。

由此可见，粽子只在端午节的早上吃，跟其他家属一起吃饭时则不会吃，而且互相之间也不会馈赠粽子。还要注意的一点是，吃粽子的机会不只限于端午节当天。实际上，端午的前一两天就已经开始吃粽子。2015年6月19号，即端午的前一天，因为当天比较热，所以晚上六点多钟在屋子外面的院子摆桌子和板凳吃饭（图8）。吕阿姨喊笔者过来吃饭，然后给我一个粽子并说道：“你吃！玩玩哦！”

相比之下，日本人一般不会雏祭之前吃米花糖。但是在Q村的话，关于吃粽子的时机的规定是比较宽松的，端午节当天也没有什么特定的仪式等。并且，有些人在端午节也不吃粽子。比如说，2015年端午节的早饭时，虽然粽子的数量十分多，但吕家媳妇吃了油条却没有吃粽子。可见端午时节吃粽子这样的习俗其实并不是固定的。

那么，为什么一直包粽子呢？何况吕阿姨由于身体不好，只能减少包粽子的数量了，但依然还是为了自己家，不放弃包粽子，甚至还要包给自己的妈妈。为了解答这个疑问，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吕阿姨叫我吃粽子的时候讲到的那一句话，“玩玩哦！”。

在Q村，村民说“玩玩”这个普通话时，还会用“白白相 (*babaxia*)”这个方言里的词汇。这个词指的是：比如某人访问村里的友人或到亲戚家聊了一会，或者瞧瞧在打牌或麻将的一群人诸如此类的行为。即村民实际用这个词汇来形容跟亲密的人在一起，或聚一聚的状态。他们就是用这个词汇来形容送粽子，吃粽子的场景。

平时吃饭或者早上吃稀饭的时候，没有人会说“白白相”。使用这个词汇的情景是：比如春节，人们一边喝茶一边嗑瓜子，跟他人一起共享时间的时候，而且，这个时间具有非日常性价值。分享粽子，跟亲密的人一起过端午节就属于这种特别的时间，正因为如此，吃粽子才属于是“玩玩”的范畴。

端午节时和其他国家法定节假日一样，平时打工而离开村子的村民也会回来，村内充满了热闹和欢乐气氛的同时，亲密关系也得到了再确认。这样看来，吕阿姨所说的“玩玩”这个词汇，就不只指是吃粽子，它反映了一种与亲密的人共享时间这样的很朴素的动机。该动机就是说，“一起”享受端午节的气氛——用中文里的民俗概念的话，就是“应节气”。

日本民俗学里有讨论：民间的节日是跟一年的300日以上的单调的日子相对称的，孩子掰着手指头计算和等待的，也是父母早就做好某个准备，跟邻居或亲属们一起安宁、和睦地渡过的一个日子（湯川 2003：17-18）。Q村的端午节也是为了享受专门为这一天而准备的非日常性的粽子，以及跟一年到头都在村子外面的亲属们一起共享安宁、和睦气氛的快乐时刻。因此，像[个案2]一样，村民会尽量把粽子给“可怜”的人，试图分享端午的节日气氛。在此，粽子是一个为了表达这种人情而存在的“节日食品”，而并不是为了纪念屈原或伍子胥而准备的。

另外，研究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的学者钱杭和承载指出：在吴语方言地区，因为端午节的时候“人家各有宴会”所以端午节也叫做“白相节”（钱、承 1996：266）。虽然说今天的Q村里没有听到这个表达，但Q村村民还是在端午节的时间里“白相”了。粽子这个赠

与物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的。

4 讨论：同时代世界里的粽子

4.1 “外在刺激”里的端午節

《作为文化批判的人类学》(Marcus and Fischer 1999) 以来，人类学界里已有共识：了解某个地域的时候不应该把它看做固定的、静态的世界，不能忽略超越该地域的社会力量及其彼此间的互动。笔者到这里为止所描写的 Q 村的端午节属于同时代世界里的现象，但却不是孤立闭锁的地域社会里的现象。以下我们将从国家政策、历史的经纬、以及味觉的时代变化等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来重新讨论粽子的内在影响。

首先看一下国家政策和端午节的关系。周星指出中国官方层面开始重视端午节这个传统节日的原因是受韩国2005年“江陵端午祭”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的刺激¹²⁾(周2016: 102)。实际上，在中国国内关于端午节的话语里可以看见“爱国主义的政治色彩”的出现¹³⁾，发生这样端午节的政治化的最大理由之一是，政府此举旨在通过“传统”统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凝聚力：

中国传统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光明日报 2012)

另一个国家政策介入的很好的例子是，2008年开始的，端午节(农历5月5日)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的个案。其实，2007年12月份公布这个决定(人民日报 2007)前后，已有些学者讨论过作为“民族文化”的传统节日对于社会建设的作用(高 2006; 2007; 2009)。例如，高丙中曾强调，“清明、端午、中秋、重阳作为假日，一方面可以比那些空泛的日子更能够实现刺激消费的目的，另一方面还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若干重要的价值有更好的机会在生活中自然地传习”(高 2006: 9)，“国家机构和公共知识分子对于建设、丰富和发展本民族的认同文化是责无旁贷的。推动传统节日民俗的复兴和发展是我们完成这项使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高 2006: 11)。还有学者认为端午节等“四大节日虽然其活动的形式千差万别，民众虽身处异地，但主要的民俗活动保持了一致性和统一性，使得中华民族在传统节日上保持了高度的民族认同”(王 2010: 170)等。综上，国家与学者对端午节的重视客观上推动了传统的复兴以及“端午节回家吃粽子”的合理性叙述，虽然我们暂时无法确定国家话语与民间层面对端午节的态度之间的关系如何，但可以想见这些鼓励和倡导无疑增强了老百姓生活中的节日气氛。

再次，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的历史过程也对 Q 村的端午节庆带来的巨大影响。尤其是打倒“封建迷信”运动的影响仍反映在今日 Q 村的端午节里。过去在端午节当天的12点，即“五月初五正午时”有一个神秘的传说：那个瞬间，“所有的动物都不叫了，很安静”(cf.

濮阳 2015 : 196)。但吕叔叔在向笔者讲述这个传说的时候，一来就以“这是假的”为开场白，接下来还说“这是旧社会时候的迷信”，他的叙述里有这样断定的倾向。另外，“集体化的时候”，粮食严重不足，吕叔叔因为老是挨饿，所以他说当时“我们吃草”，更不用提制作粽子了。虽然通过笔者的访谈也无法确定粽子复兴的准确时间或具体的过程，但据吕阿姨说，大跃进后的1962年~1963年左右慢慢恢复了吃粽子的习俗。到了1984年，生活逐步安定起来。以致分家后准备不了粽子这个情况，反而成为引起了家庭关系矛盾的记忆了。在节日里准备粽子的习俗显现了强大的持续性。

最后，看一看以“麦当劳 (McDonald's)”为代表的食物全球化与其影响。高淳没有麦当劳，但是肯德基 (Kentucky) 在当地具有强大吸引力，而且2015年必胜客 (Pizzahut) 和星巴克 (Starbucks) 也开始入驻高淳县城。这说明了新的聚居点以及味觉代际差异的出现。在这些洋气的店里可以看见阎云翔 (Yan 1997) 所说的“小朋友的天国”一样的生日会的场景，还出现了“东亚式的聚会” (Watson ed. 1997)，例如在店里会看见年轻人爱打牌的情景。另一方面，Q村里的小朋友爱这些新的味道，出现了一种新流行的情况。他们一听到自己的爸妈要去城市办事，就会说“我也要去高淳 (县城)！要吃鸡腿！”。但吕叔叔，吕阿姨说“我们 (的年代的人) 不吃”，所以没有对城市里的“垃圾食品”上瘾。但这样的变化确实带来了味觉上的变化，如在 [个案3] 看到的那样，年轻一代出现了不喜欢吃粽子的人。

但连系笔者所介绍的个案，吃不吃粽子就不只是味觉层面的问题了。接下来我们再次思考一下作为“仪式食品”的粽子的“性格”。

4.2 粽子的“仪式感”，“应节气”与“内在影响”

关于仪式和食物，Mintz and Du Bois 曾指出，“食物 (ritual meals) 再确认 / 转变 (reaffirm or transform) 仪式参加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即使仪式的参加者之间，没有形成对于食物的意义的共同理解，这种现象也会发生” (Mintz and Du Bois 2002 : 107-109)。Q村的端午节并不具备仪式性，但与此同时Q村村民也没有意识到关于粽子的意义 (屈原或伍子胥) 的情况之下，像 [个案2]，端午节成为了再确认相互扶助关系的机会。与此同时，像 [个案1] 显示的那样，分家之后的粽子改变了婆 / 媳关系、父 / 子关系。

还有，Mintz and Du Bois 指出了“有的时候，围绕食物的仪式也没有承载象征的意义” (Mintz and Du Bois 2002 : 107-109)。联想到婚礼蛋糕 (wedding cakes) 的象征性的话，就容易理解——在砂糖很珍贵的时代，婚礼蛋糕也许象征 = 代表 (represent) 了繁荣与幸福。在今天的Q村，对于年轻一代人来说，粽子所拥有的象征魅力 / 幸福感也许不如作为舶来品的汉堡包。但是，思考作为节庆食物的粽子的持续的话，重要的一点不是味觉，也不是象征价值，而是粽子固有的“仪式感”。

为了进一步了解端午节要准备仪式食物即粽子这个实践和其正确的举行所拥有的仪式性意义，我们还可以想到日本的情人节。按照山田晴通所说，日本情人节的特色是：(a)

主要的馈赠物是巧克力；(b)是从女性到男性的单方面馈赠；(c)这被认为是（女性）可以表白爱情（好意）的（唯一的）机会（山田 2007：48）。而且，情人节当中，重要的是馈赠巧克力这个仪式性的手续本身，以及赋予其行为的意涵（好意或感谢），吃不吃甜品本身不是关键。“情人节巧克力的价值是在馈赠过程中所形成的，离开这个过程价值就不会存在”（小笠原 1998：112）。同样，粽子也是为了端午节而做，分享，其中包含的亲密性的意义比吃粽子本身还重要。我们通过 [个案 3] 确认了 Q 村村民也并不重视吃不吃粽子。另一方面，如 [个案 1] 所介绍的那样，不再准备粽子的行为会引起人际关系上的摩擦。

另外，有学者所提出的，把粽子的“流动”看作为构造利益关系的手段这样的目的论的视角（比如，“投资”（常 2009）或者是《礼物的流动》（Yan 1996））是不太适合于围绕粽子人际关系的。馈赠粽子的行为包含着亲密性表达，同时还有怜悯之情，其最终目的是“一起享受”端午节（“白相”），即是说重点在于“应节气”。

虽然粽子在围绕端午节的“外在刺激”之下不断发生变化，但作为一个“仪式食”的粽子没有丧失其“内在影响”，也许正是因为那里存在着很单纯但很根深蒂固的理由：应节气。

5 结语

本文借助以包粽子为开端的叙述，并非是探寻民俗渊源的路径或是象征论的路径，而是试图在村落社会的生活情境下探讨粽子的意义。本文的民族志学上的目的除了记录关于粽子制作的民俗资料外，还试图实现以下两点：其一是对实际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性仔细地抽丝剥茧，而不是简单地用“关系(*guanxi*)”这一概念一概而论；其二是描写粽子所包含的与所谓的“粽子的象征性”在不同的意义上的“仪式性”（仪式感）。

作为仪式食物的粽子虽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吃，也可以不吃，但是到了端午这一天却一定要准备。这是因为粽子的价值是在赠与过程中所形成的，与此同时，这种赠与行为也是更新/再确认社会关系的一个契机。

按照本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享非日常性时间这一价值观对于粽子的传承（内在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在当代中国农村，被亲手制作并赠送的粽子是为了应节气而存在的，即粽子在这一背景下成为了承担人际交流功能的媒介物。

谢辞：本文为笔者担任2016年度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特别共同利用研究员期间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研究期间，本人曾得到丰田基金会（The Toyota Foundation；2012.10~2014.9）、中国政府奖学金（2013.9~2015.7）以及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16J06593）的资助。感谢田野工作中帮助过我的人们，还有首都大学东京的伍扬扬先生以及颜行一先生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提出的建议以及对文本进行的校对，在此一一深表鸣谢。

注

- 1) 自2001年起每年的九月下旬至10月上旬当地都会举行“高淳螃蟹节”(高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2010: 358)。最近几年由于高淳境内水产养殖业的兴盛,将农地废弃用来养殖虾蟹的情况开始出现(川瀨 2016b: 122-123)。
- 2) 在与高淳旅游相关的指南书中,此地是一定会被介绍的(cf. 川瀨 2016a: 265n3)。此外,在新版的地方志中也专门新增了一个条目介绍此地(高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2010: 484-488)。
- 3) 更具体来说,地方文献中所列举的高淳特色的食物还有山萝卜、霉干菜、腌酸菜、萝卜干、糖粥藕、茧子、软香糕、桂花糖芋头、茶香子、在塘菱等等(高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1988: 742-743; 魏 2014; 苏 2014; 白 2016)。
- 4) 中国其他地方所有报告的“挂菖蒲”(徐主编 1998: 399-401)、“插艾子”(徐主编 1998: 401-402)等习俗,在端午节的高淳也可以看见。
- 5) 还有其他地方文献里指出,“旧时,高淳人在端午节,按照风俗要吃‘五黄’,即黄鳝、黄鱼、黄瓜、鸭蛋黄、雄黄酒”(白 2016: 196)。
- 6) 也叫“元宝”,糯米炒熟以后熬糖稀做成的圆形团子。
- 7) 长子之所以没有养老的义务是因为他的家计比较苦难,分家时已经跟兄弟之间说好。详细内容会在别文章中记述。
- 8) 用电饭锅或较大的锅煮制,煮制过程中除了酱油、盐等调味料以外还加入茶叶的一种风味蛋。
- 9) 但其实吕叔叔的女儿早在端午节前一天去市场买了猪肉送过来的时候是把它分为7个袋子而拿来的。就是说,她除了父亲和其兄之外,还要送给“母亲的兄弟”以及“父母的母亲”。
- 10) 平时的话,Q村村民早上吃很简单的饭,比如,萝卜干或榨菜、酸甜大蒜等,以及稀饭或“泡饭”(头一天晚上剩下的饭)。
- 11) 据报道人说,以前大家喝雄黄酒,让不能喝酒的孩子尝一下,把筷子蘸点酒给他们舔舔。还有用酒在孩子的额头上写“王”字,说是为了“像老虎一样,身体健康”。
- 12) 2006年,端午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端午节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也获得成功。关于更具体的话语变迁,参见宋颖介绍的“端午申遗事件”(宋 2007: 106-111)。
- 13) 政府系媒体之一光明网还开了“我们的节日端午”这个网页(http://topics.gmw.cn/node_12448.htm; 2017年5月25日最终阅览)。

参考文献

〈英文文献〉

Carsten, J.

2000 Introduction: Cultures of Relatedness. In J. Carsten (ed.) *Cultures of Relatedness: 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Kinship*, pp.1-3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cus, G. E. and M. J. Fischer

1999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secon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intz, S. W. and C. M. Du Bois

- 2002 The Anthropology of Food and Eating.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1 : 99-119.
- Watson, J.
- 1988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Funerary Rites: Elementary Forms, Ritual Sequence, and the Primacy of Performance, In J. Watson and E. Rawski (ed.) *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pp. 3-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tson, J. (ed.)
- 1997 *Golden Arches East: McDonald's in 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Yan, Y.
- 1996 *The Flow of Gifts: 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7 McDonald's in Beijing: The Localization of Americana. In J. Watson (ed.) *Golden Arches East: McDonald's in East Asia*, pp. 39-76.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日本文献〉

朝倉敏夫

- 1995 「食の生活文化」河合利光編『生活文化論—文化人類学の視点から』pp. 43-64, 東京：建帛社。

王仁徳

- 2001 『中国殷食文化』鈴木博訳, 東京：青土社。

小笠原祐子

- 1998 『OLたちの〈レジスタンス〉—サラリーマンとOLのパワーゲーム』東京：中央公論社。

何彬

- 2004 「儀礼食・節句食のシンボリズム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中国北方漢族の場合」国学院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編『東アジアにみる食とこころ—中国・台湾・モンゴル・韓国・日本』pp. 3-37, 東京：おうふう。

川瀬由高

- 2016a 「渦中の無形文化遺産—南京市高淳における祭祀芸能の興隆と衰退の事例から」河合洋尚・飯田卓編『中国地域の文化遺産—人類学の視点から』(国立民族学博物館調査報告 136) pp. 247-270, 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館。
- 2016b 「流しのコンパイン—収穫期の南京市郊外農村における即興的分業」『社会人類学年報』42: 121-141。

佐々木高明

- 1987 「照葉樹林と日本文化」『写真測量とリモートセンシング』26(2): 61-69。
- 1994 「照葉樹林帯の食物文化」『調理科学』27(3): 197-203。

櫻田涼子・稲沢努・三浦哲也編

- 2016 『食をめぐる人類学—飲食実践が紡ぐ社会関係』京都：昭和堂。

張燕

- 2012 「端午節に見る中国の民間信仰」『人文学論集』30: 191-202。

本間伸夫・石原和夫

- 1995 「東西食文化の日本海側の接点に関する研究 (VII) —端午の節句の粽, 餅, 団子」『県立新潟女子短期大学研究紀要』32: 87-95。
- 1996 「東西食文化の日本海側の接点に関する研究 (VIII) —端午の節句の粽, 餅, 団子の全国

的な分布（その1）」『県立新潟女子短期大学研究紀要』33: 1-14。

1997a 「東西食文化の日本海側の接点に関する研究（X）—端午の節句の粽，餅，団子の全国的な分布（その2）クラスター分析法による節句全般の解析」『県立新潟女子短期大学研究紀要』34: 113-124。

1997b 「東西食文化の日本海側の接点に関する研究（XI）—端午の節句の粽，餅，団子の全国的な分布（その3）クラスター分析法による柏餅，餅，粽の解析」『県立新潟女子短期大学研究紀要』34: 125-137。

中山ハルノ

1964 「端午の節句と粽の史的考察」『研究紀要』3(1): 119-130。

山田晴通

2007 「『バレンタイン・チョコレート』はどこからきたのか(1)」『東京経済大学・人文自然科学論集』124: 41-56。

湯川洋司

2003 「暦と年中行事」新谷尚紀・波平恵美子・湯川洋司編『暮らしの中の民俗学2 一年』pp.9-36, 東京：吉川弘文館。

〈中文文献〉

白水

2016 高淳有美食 人人都喜爱，《高淳地方文化》2016(2): 183-198。

常向群

2009 《关系抑或礼尚往来》（毛明华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陈后翔

2014 高淳民间糕点，《高淳地方文化》2014(1): 137-139。

徐杰舜（主编）

1998 《汉族民间风俗》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费孝通

1991 《乡土中国》香港：三联书店。

高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1988 《高淳县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高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2010 《高淳县志（1986-2005）》（上册・下册）北京：方志出版社。

高丙中

2006 年节文化与当代社会（笔谈）：对节日民俗复兴的文化自觉与社会再生产，《江西社会科学》2006(2): 7-11。

2007 （四大传统节日应该称为国家法定假日）端午节，《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6: 10-13。

2009 节日传承与假日制度中的国家角色，《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9(5): 27-31。

濮阳康京

2015 《高淳文脉探幽》南京：南京出版社。

钱杭、承载

1996 《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宋颖

2007 《端午节研究：传统、国家与文化表述》（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苏洪泉

2014 怀念高淳的那些吃食，《高淳地方文化》2014(1): 140-144。

王崑岫

2010 传统节日列为法定假日的文化意义与传承发展——以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四大传统节日为例，《浙江学刊》2010(4): 169-173。

万建中、周耀明

2004 《汉族风俗史（第五卷）：清代后期·民国汉族风俗》上海：学林出版社。

魏云龙

2014 高淳的腌菜，《高淳地方文化》2014(1): 145-151。

杨红梅

2011 侗族粽子节的原始经济形态考察——以黎平县竹坪村为聚焦，《原生态民族化学刊》3(4): 88-92。

杨红梅、杨经华

2012 侗族粽子理民俗的人类学考察——以贵州黎平县竹坪村为聚焦，《原生态民族化学刊》4(4): 153-156。

钟敬文（主编）

2008 《中国民俗史（民国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周星

2016 端午节和“宇宙药”，《本土常识的意味：人类学视野中的民俗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02-129页。

〈媒体报道〉

光明日报

2012 弘扬传统节日文化现状与对策，《光明日报》2012年12月22日，第12版。

人民日报

2007 明年起清明、端午、中秋纳入国家法定节日，《人民日报》2007年12月17日，第1版。